

黎澍集外集

徐宗勉 黄春生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澍集外集/ 徐宗勉、黄春生编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2

ISBN 7 - 80190 - 062 - 6

. 黎... . 徐... 黄... . 黎澍 - 文集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9867 号

黎澍集外集

编 者 / 徐宗勉 黄春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 65232637
责任编辑 / 陈文桂
责任校对 / 闫晓琦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 32 开
印 张 / 11.125
字 数 / 271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062 - 6/ K·036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说明

这本文集共收录文章（包括提纲）64篇，信函14件，并附家史1篇。

所收文章中，有30篇属未发表或未完成的手稿；在发表过的35篇中，有30篇未曾收入已出版的作者的文集，故而本文集名为《集外集》。

所收《五四运动》、《1905年俄国革命和中国》两文，曾被收入1956年出版的《近代史论丛》。事隔多年，这本文集已很难见到，本文集选入这两篇文章，是想让读者从中多少看到作者建国初期的重视讲述史实、尊重历史真实的史学风格。《毛泽东与百家争鸣》原是《未完成的回忆》一文中的一节，此文最早见于1988年出版的文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这本文集印数很少，不易见到，加上《毛泽东与百家争鸣》一节也不见于作者去世10年后始获出版的《自选集》，因之，也将这一节文字单独收入本集。

就内容说，本文集所收文章和信函大体有这样几类：一、有关历史的研究论文和评论；二、思想、政治评论；三、有关文化建设和文艺问题的评论；四、有关当代人物、书刊的评论和介绍；五、对故旧的回忆。这些文字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且含有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其中有的是已出版的作者各种文集、专著中见不到的。所以，本文集对了解和研究作者의思想和生平很有帮助。编辑、出版这本《集外集》的用意也在于此。

目 录

序 言	李 锐	1
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		1
五四运动		19
1905 年俄国革命和中国		32
揭露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即是揭露苏修对 马列主义的背叛		52
沙俄的对外扩张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历史观		55
重新认识历史		61
我的主要学术观点		65
中西文化问题		67
太平天国的研究如何深入		76
有关清末顽固派与义和团的一些看法		79
“民主”古义与清末新党的理解		82
辛亥革命与青年		84
在中俄关系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91
在 1982 年中国现代史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95
祝《历史人物》创刊		103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辩证法		107

极左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108
关于修改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几点参考意见	116
在中宣部会议上的发言（一）	122
在中宣部会议上的发言（二）	126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群众示威	128
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	131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134
如何保持思想的不断创新	135
如何保证“双百”方针的贯彻	137
毛泽东与“百家争鸣”	139
对《河殒》的看法	143
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44
五四感言	149
寄语前辈	151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而斗争！	153
少壮须努力	159
运用之妙	163
座谈《大风歌》发言	166
封建残余影响与旧剧	168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 区别	175
论语言美	178
学校应当重视历史的教学工作	180
普及文史知识与建设精神文明	183
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	187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三个条件	190
关于北京文化建设的设想	193
闲话改元与改地名	196
贺罗尔纲同志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	198
谈朱正的鲁迅研究	200
《知堂书话》和周作人的文化态度	204
宋庆龄——中国的伟大的女政治家	207
《宋庆龄传》序言	213
重印范文澜著《大丈夫》序言	215
《洋务运动史论文选》序	221
罗尔纲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序言	224
戴文葆编《中国妇女天足运动》序言	226
《吴江文集》序言	229
《沈钧儒文集》序	231
《龙云传》序言	234
《记上海 文萃 周刊》前言	236
《当代中国大事编年》序	239
《新华文摘》创刊十周年祝词	241
《中华英杰画传系列》序言	242
悼范长江同志	243
怀邓初民同志	245
忆田家英	247
杨赓传	251
致唐振常	254
致宋任穷等	261
致石方禹	263

致钟叔河	265
致刘笃平	267
致雷祯孝	269
两次炮声	270
家 史	272
黎澍先生编年	黄春生 276
后 记	徐 滨 343

序 言

李 锐

这本收录了黎澍遗稿的集子，有利于思想解放，要了解和研究黎澍是非读不可的。

集中所收录的主要是不见于黎澍已出版的文集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写于 1978 年以后，半数以上未曾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当时还属于“犯忌”一类，难以被报刊采纳；也有的本是在内部讲的意见，一时还不宜或不需要对外露布。这两类文字所议论的多是相当重要甚或相当尖锐的问题，对研究黎澍思想尤具价值。

黎澍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的思想极为活跃，对现实、对历史、对世界的思考 and 认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他已痛感有必要对自己以往的认识来一次再认识。1984 年，他以“再思”命名自己的文集，意即在此。

不过黎澍自己并不认为他的认识已是到“底”了。他当年为他的文集取名时有意不用“反思”而用“再思”，就是为避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经过这样一次反复，认识已经完成，真理完全在握了。《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说得很明白：

“再思”也只能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事实

上本书辑录的文章已经显示出这种必要，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讲的不是作者假作谦虚的套话，而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实际过程。就此而言，黎澍确实掌握了认识的规律，他由自己的切身体会，才能做到不折不扣地“破除迷信”。

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凡是愿意思考、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不免要回过头来，对自己原先相信甚至是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一番审视，从中得出某种新的认识。能够做这种反思的人当然不少，但黎澍的反思与众不同，要深刻、彻底得多。他思想的锋芒所指，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问题或某条理论公式，而是触及指导、规范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理论原则和规章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他于1988年9月曾说，他在这十年中所努力的就是两件事：“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何以要“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的严重存在，习惯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只是奉命批判、否定资本主义而不知其他，以为这就是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之所以至今还是思想政治上的一大工程，不仅是惟上命是从、还在继续造神的旧习难改，根子还在教条主义，即以简单的方法生搬硬套“本本”上的社会主义。所以，黎澍在1988年11月为其《自选集》写的序中又说，他的这本书的“要义”，“就是在这里开始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问题”。

提出了什么问题？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是重要的一个；“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一个。如果天假以年，相信黎澍一定还会提出一个又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使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和伪科学原形毕露。

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就在提出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问题的同时，黎澍还说了以下一些话：

建国以来我们把那些根本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认识、观念、理论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丝毫不可更改的圭臬，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觉得无隙可破。但是这些认识、观念、理论给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至今还没有人做过细致的研究。

如果任凭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或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那些失去真理性、不适于中国国情的结论、观点，那么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越是固止不动的，就越说明潜积着异己的力量。（《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未定稿》1989年第3期）

试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除了黎澍，还有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发表过这样振聋发聩的议论，做到如此彻底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呢！

这本文集也收录了很少几篇写于建国初期的文章。从这些旧作中可以看到，黎澍以往确为他自己所说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宣传者”，在思想、观点上也有着同别人一样的局限。但同时这些文章显露出重视事实、尊重历史真实和不尚空谈的风格。文如其人。尊重事实，不说假话，不说套话，不悖良知，可以说是黎澍的本性。就是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统治下，他的这种本性虽受到压制，仍时时表露出来，以致为自己招来种种灾祸。

例如，据我所知，1957年反右运动中，黎澍公然不同意将

本单位年轻人徐宗勉（当时是胡绳的秘书）定为右派分子，因为他知道徐只是在党小组学习会上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疑问，以供讨论，不属于什么“右派言论”。结果他被指摘为政治立场右倾，遭到不止一次的批判，并被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农村“受教育”。从此，他在政治上不再受到上面的信任。

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黎澍发现已“摘帽”的原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沈元的历史文章写得好，便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沈元的文章，并通过正常组织手续将沈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料此事引来一场风波，有人甚至写信给毛主席告状，说不该重用右派。黎澍再次受到很大压力。但同情他的老友也不少，他们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写了一个报告，使此事不了了之。

随后，黎澍又发表了《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此文因其鼓励青年刻苦钻研、奋发有为的内容，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高校学生中受到广泛好评，却受到中宣部和学部的严厉批评，罪名是鼓吹“白专道路”，反对“政治挂帅”。据黎澍自己说，此文的根本涵义在暗指政治运动搞得太多了，对培育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十分有害；应当提供条件，让年轻人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学习、钻研科学文化，奋发有为，发明创造，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说这篇文章反对“政治挂帅”倒也并无大错。当时所谓的“政治挂帅”，说到底就是用人造的据说是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来压制个性，摧残人才，维护政治专制，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黎澍用曲笔来反对这样的“政治挂帅”，恰恰是他一贯尊重实际，爱护青年，珍惜人才，忧国忧民的表现。

不久前故去的唐振常先生所撰《黎君墓表》有言：“毕生求真求是，权威非尽信，势力不能移”。这是对黎澍伟大人格的很好的概括。我认为，黎澍的这种人格不仅表现在治学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这是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2003年3月1日

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

一 民意表现于诽谤

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不但没有产生过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也没有存在过类似言论自由的事实。

中国四千年历史是一部等级制度发展史。越到后来，等级制度就越严格。孟子已经将发展到当时为止的事实进行归纳，把人区分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两个不同的等级。后世更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贯注到一切法令和制度里面去，使得做老百姓的主要就是做刑罚的对象。于是老百姓的政治意见只有借助于一个永远没有变更过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诽谤。

传说中最贤明的政治措施是对于诽谤表示宽容。

《大戴礼记·保傅篇》称述尧舜之世的政治说：“于是有进善之，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论卫人逐献公一段也有同样的说法：“土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

其时中国尚在氏族社会时代。这个传说对不对，当然还有待考证。我们姑且假定它是对的，这个德政也没有存在好久，因为后世仅仅称颂尧舜有过这样的德政。

自从有史可考以来，诽谤是被禁止的。有人认为春秋战国

时代有学术自由，过细研究起来，这种所谓学术自由也只是诸侯均势局面下的产物，为出将入相的游士和游士的老师所享有。一旦均势局面打破了，游士的时代过去了，这种学术自由也就消失了。就在游士们出将入相而他们的老师享有学术自由的时代，老百姓也没有政治的发言权。所有这一时代最成功的政治家，都是禁止老百姓对他们的施政表示意见的。仅仅有一个例外，齐威王因相国邹忌一番说词，用命令对老百姓的诽谤表示欢迎。

……乃下令：“群臣使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者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战国策》对策士们的作用是夸大的。进谏的人净是“群臣”，可知命令虽然容许“谤议于市朝”，并且可得“下赏”，老百姓却仍旧不感兴趣，他们都没有起来说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弃市。汉高祖入关，宣布除秦苛法。但是后来的汉律终于还是秦律的复活。汉文帝宣布除“诽谤妖言法”，表示欢迎群臣和“远方之贤良”进谏诤，事实上只是为了推动选举贤良方正，能极言直谏之士而发表的补充命令，也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文帝以后，朝臣因诽谤罪被处死或受刑的很多。以后的朝代再也没有例外。朝臣诽谤通常都以“大不敬”论罪，可以株连到父母妻子兄弟和其他亲戚朋友。老百姓更不用说了，连一个芝麻绿豆官也不容许指摘。

然而诽谤存在着。人民对政治的最直觉的反应就是诽谤。即使在传说中最残酷的统治底下（传说中的残酷统治是特别残

酷的)，人民也要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诽谤政府是要砍脑袋的，于是有时候诽谤又表现为讽刺。

在古代社会中，人民对于政治的诽谤与讽刺很流行。到后来两者都慢慢地采取了诗的形式。在孔子时代，存在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以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共存三百五篇。这就是说，三千多篇里面，有很多诽谤或讽刺得太厉害，不“可以施于礼义”的都删掉了。这由孔子删定的三百五篇，被视为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但其中仍不乏直骂当道的篇章。比如：“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比如：“伊谁云从，惟暴之云！”骂皇帝的，比如：“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骂庄园领主的，比如：“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比如：“投诸豺虎，豺虎不食！投诸有北，有北不受！”

顾炎武说：“诗者，王者之迹也。”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况。民间的诗没有一定的作者，只是一种流行的词句。传开了，最后才有人记录下来。正如去年湘桂战争中流行的“一万二万，路边站站；十万八万，才叫逃难！”是一种怨望，一种讽刺，即使政府不高兴，也无法查禁。正因为无法查禁，于是《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就成了传说中最好的看看民心向背的办法。

历史上有一个诽谤、讽刺与诗集中一个目标，并且记录得最为完备的例子：

（周厉王三十三年）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而言之于口，成而

行之，胡可壅也！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言。

三十四年，召公作诗讽王。凡伯作诗，切责僚友，因以讽王。

三十五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诗刺之。国人作诗刺王。

三十七年，王心戾虐。万民弗忍，乃相与叛，袭王。王出奔于彘。

后来随着阶级的分化，随着财富与土地之集中，文化也为贵族、商人与地主阶级所专有。最初产生于人民劳动的诗，逐渐由文化的专有者送进了牛角尖，变成音韵格律都很严格、非下等人所能运用的东西了。老百姓没有跟着走进牛角尖里去。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诗，这就是民谣。民谣是人民的政治诗，是民间诽谤与讽刺的共鸣。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了人民怨望政府的记载。这种记载，有时候是明明白白的，有时候是东鳞西爪透露出来的。有道之君如汉光武，满朝文武恭维他，他自己晓得：“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乎？欺天乎！”

历史证明，政治诽谤永远跟一切朝代的一切专制主义同在。

二 何谓清议？

有人说，我国有清议，清议就是代表民意的言论界。

要确定清议是不是代表民意的言论界，就必须弄清楚历史上所谓清议是什么。

见于历史记载的清议，第一是乡校。《左传》鲁襄公三十一

年记子产不毁乡校云：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从这一则记事可以看到，乡校本是一种自在的清议。早晚没有事情的时候，大家到教授先生那里去聊聊天，因为乡校并未贴上一张“莫谈国事”的条子，所以聊天不免聊到政治上去了。就为这点事情，学校都几乎要关门，这种清议是执政者所不愿听的。子产本人也不例外。六年之后（鲁昭公四年），子产因为从事多面外交，要花很多钱去买好晋楚两个大国。这钱要向老百姓身上去榨取。于是滥征苛捐杂税，以致老百姓怨声载道，骂他父亲被人杀死在路上，他自己又毒得像“鼷尾”（意思就是也会死在路上）。他都坚持说，“民不可逞，度不可变。”完全忘记不毁乡校时所说的“其所恶者，吾则改之”的话了。再过两年（鲁昭公六年），他甚至更进一步铸刑书，要用严刑峻法来压迫老百姓。这就证明了子产之不毁乡校，也不过是用点惠而不费的小手段，表面上装出一副尊重民意的样子而已。观乎子产不毁乡校而《春秋》大书特书，可知在春秋时代，毁乡校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乡校式的清议是清议形式之一种。这种清议在后世就是街谈巷议或茶楼酒馆的私人谈话，作为一种空气而存在着。后世执政者对这所谓清议的态度，大约有三：一是不理睬，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二是理睬，打听到外面空气不好，就想办法缓和一下，比如开言路等等；三是禁止。这时就轮到下头看上头的空气如何。空气不好，走路都得当心，像小偷一样，左顾右盼。“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辟钳

口”是描写这空气的警句。所谓“清议亡而干戈至”，指的就是这样的時候。

乡校式的清议而外，还有一种为朝廷所借重的清议。两汉选举和魏晋九品中正都是借重清议来实行官吏民选的制度。

两汉贤良、方正、茂材、孝廉等科，乡举里选，由地方官主持其事。地方官与豪绅势族勾结，结果选举就为豪绅势族所把持。选举出来的，大抵非豪绅势族子弟，即已经做过官的老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贤良方正茂才直言多举现任官》记云：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于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董仲舒已为博士；冯唐已为骑都尉……王吉已为云阳令……贡禹已为凉州刺史……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孔光已为议郎……盖宽饶亦已为郎……陈咸已为九卿……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才……此茂才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又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

魏晋仍以乡论清议取才，由政府另派中正官主持。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送大中正核实，再送司徒复核，然后交尚书选用。但中正又与权贵富豪纳结，进退随意。《晋书》卷四八《段灼传》载段灼上疏云：

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载刘毅上疏云：